

Jakob Vedelsby

The Law
of
Humanity

人类的
法则

雅各布·威厄斯比——著 周一云——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人类的法则

The Law of Humanity

(丹麦) 雅可布·威厄斯比 著

周一云 译

This book's translation work is sponsored by **DANISH ARTS FOUNDATION**

The Law of Humanity by Jakob Vedelsby

© Gagarin Publisher/ Andersen Literary Agency and Jakob Vedelsby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的法则 / (丹) 威厄斯比著; 周一云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33-1756-6

I. ①人… II. ①威…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 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917 号

人类的法则

(丹麦) 雅可布·威厄斯比 著 周一云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4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56-6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初秋的空气是那么美妙空灵，那么奇异透明，附近所有的景物都显得更近，更清晰——河对岸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似乎都能用双手抓住。

——雅科布·A. 里斯^①

^① Jacob August Riis (1849—1914)，原籍丹麦的美国记者和社会改革者，最早的纪实摄影师之一。

第一章

“人类的法则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到处是死路和上锁的门。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

广播信号“嘶”的一声消失了，就像一根头发烧成了灰。

“该死的。”司机嘟囔着，用手指敲击着那镶在红木框架里闪着蓝光的收音机。

“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听卡尔·伯恩斯坦的爱人^①播音，她可真他妈的有意思。”部长说，笑得肩膀乱颤。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努力排除。”

“这不是我的错。”司机小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

“关掉关掉！”部长大声嚷嚷着。

我挤出一个微笑。我实在不想跟那傻瓜再说一遍，卡桑德拉是我多年的朋友，不是爱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是同性恋，至少也是双性恋。我攥紧了手中的公文包，空气中可以嗅到新鞣制的皮革气味，那是卡桑德拉送给我的礼物，她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手工缝

^① Kæreste 不分男女，故译为“爱人”。

制皮包。部长自得其乐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他的好情绪随时会消失，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落入圈套，不得不在他为下属即兴设置的冲突中自卫。他的下一段台词很可能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爱人的广播？”或者：“你笑话我，是不是？”他认为有责任让我这样的官场暴发户明白，不要以为屁股已经坐稳。他一定会把我看得更紧，并向我显示：外交生涯有其代价，这代价极其高昂，只有那些最有才华、最努力，而且最冷酷无情的人才能最终穿过针眼^①，得到人人垂涎的大使职位。其实我具备所有这些必要的素质，只不过身旁这个精神病不知道罢了。

“现在彻底完了。”司机一边说，一边按着按钮。他停在另一个频道，震耳欲聋的流行乐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我们活像交叉火力网下的士兵。他还没来得及关掉，部长就嚷嚷起来。

“你也完了！还不赶紧关掉它。”

“对不起。二十五秒后到达。”司机低头对着手腕旁的对讲机说。

他当过特种兵——我看着他那公牛一样堆叠了五层肌肉的脖子想道。

“这次你一定得完全记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伯恩斯坦书记官。当我们今天离开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这件事就彻底了断了，明白吗？”他斩钉截铁地说，眼睛不看我。

我认识他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对视过。他无疑要将这种过于个人化的目光接触留给家人——目前包括一个两岁的女儿和第三任太太。流言说他仍然和前任太太们纠缠不清，不再见已经长大的前房孩子们。他追求那些显然比他年轻、模特儿式的美丽女人。他对

^①典出《新约·马太福音：19：24》：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卡桑德拉也有某种兴趣。她四十岁了，看上去只有三十。人们想不到她会有一对十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家里晃荡。部长曾在了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她裸身站在林边的白桦树之间，长发像轻柔的丝绸一样在胸前飘荡。

我研究过这位部长。他的无边眼镜后面有一双多水的眼睛，眼白上堆积着黄色的脂肪，上面布满红色血丝。眼袋突出，面颊上爆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他的牙齿是石灰白的种植牙，就像华盛顿和好莱坞那些名人一样。现在他已经跳下了车，走完一半台阶，后面紧跟着两个保安人员，我拿着公文包和一大沓文件，还没来得及挪身到车外。他打开克里斯钦堡^①的大门，脚步像敲鼓一样重重地落在地板上，我赶紧跟在他后面。

“那个傻瓜转台之前她在说什么？”他瞟了一眼正对着手机讲话的司机，“是不是理想主义的骗局，合作共同体，新法律什么的？”

“我没听见，他关机了。”我喃喃地说，侧身进门，跟在部长后面走过楼梯口的岗亭。

“人类的法则。”她是那么说的。“那是什么鬼玩意儿？”他笑了，“我一定努力让它在议会通过，我们大家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然后退休，让丹麦驶向共同体的汪洋大海。”

部长的笑声变成了嘶哑的老烟枪咳嗽。他皱着眉头吞下一口痰。我们走在陡峭的楼梯上的几秒钟里，他脸上浮现出怪相。之后，他沉默了，屏住呼吸。

部长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自制力，对此他也非常得意，他甚至把

^① Christiansborg，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组建筑群，议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地下有十三世纪城堡遗址。目前的克里斯钦堡是第三座，一九二八年落成启用，前两座分别毁于一七九四年和一八八四年的火灾。

这种能力传给了孩子们。这是他送给后代最好的礼物，他在《星期日报》的一篇人物专访中这样说。他每星期至少要上一次媒体。记者们喜欢他粗鲁的魅力，他也准备好随时发言，并高效地听取智囊的建议，而在正式场合则对智囊嗤之以鼻。

我足够了解他，知道此时此刻，因为缺少尼古丁补充已长达几分钟，他正在真正的好奇心和后果难以预知的非理性爆发之间走钢丝。我沉默不语。我绝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犯更多的错误。那天我在外交政策委员会给了部长错误的信息，导致反对党在媒体上骂他是说谎者，从而铸成大错。这事黏在我身上，就像是传染病。部里的同事们都躲着我。换成别人我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错误，是零容忍文化里最大的忌讳。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处在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体制高层的关键人物对我大为失望，人人都知道，我事业的前程明显地黯淡了许多——如果在别人眼里曾经辉煌过的话。毫无疑问，我面前永远站着一个准备好随时接替我位置的同事。只要再犯一个错误，我就会在专门为体制淘汰出来的苦命人准备的位子上于此残生，比如特别顾问什么的。除非能设法离开外交部，到别的地方去试运气。但我早已不再考虑离开。我已经四十二岁，正在一步步接近那据说是高不可攀的目标。只要咬紧牙关在哥本哈根再坚持一年，就可以外放到广阔的世界，三四年后回国来担任一个副职。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半年就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和女王指派的官员，通往神圣大使职位的道路就此敞开。阿门。我经常说，要在满五十岁之前实现这个目标。这样，三十年无意识的埋头苦干将换来二十年梦想中的高薪职位，非人的工作努力将收获丰盛的成果。这想法让我飘飘然，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就不敢再想下去。

出事了。周围人们的动作活像受遥控的机器人。他们从各自的

办公室出来，手机贴在耳朵上，在走廊里机械地走来走去，像焦躁的母鸡一样撞上墙壁，也互相碰撞，对着那小电子设备嘀嘀咕咕。

“活见鬼！”部长嚷嚷着，国情局^①来的保镖不由分说架起他的胳膊就跑。“紧急情况，马上离开大楼！”其中一个保镖对我大声说。

我站在走廊中间，目送他们顺着通往紧急出口的楼梯走下去，消失。周围的人在四处奔跑。部长的智囊，那屁股被短裙绷得紧紧的女人正在拍击手机。

“丹麦酒店被炸飞了！”她嚷嚷着快步走过，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天哪，你的爱人。”她的嘴一张一合，朝我走过来一步，“我希望没……我得去找部长。”她消失在人群中。

我看着外交部长的讲演稿，那是我上午早些时候写完的。这些纸片就像笨重的天鹅腾空而起，飞向天花板，撞上墙壁，再坠落到地板上。我颓然坐在墙边一把浅蓝色的洛可可式椅子，看着外交政策委员会门上方的挂钟。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四分。

还有六分钟，卡桑德拉的广播就将结束。她的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站在演播室里，背景是朝向人工湖^②的全景窗，她的嘴紧贴着麦克风，对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微笑着。演播室设在新启用的酒店大楼二层^③的套间里。她正准备回答听众的问题。“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她说。接着司机就转了频道，播送了关于技术故障的通知，然后是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最后一切都静了下来。

我随着大家一起走出克里斯钦堡，在后面庭院里的跑马环道上

①丹麦的国家情报安全机关，成立于一九三九年。

②哥本哈根老城原外围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共有五个水池，故又称“五段湖”。

③欧陆楼层数不包括底楼，这里的“二层”相当于中文“三层”。下同。

边走边摸索我的手机。我没有把它放在不知去向的新公文包里，而是放在身上。我没有缘由地开始奔跑。我早已不跑步了，重新开始的话应该买一双跑鞋。我那锃亮的黑皮鞋底落在路面上咔咔作响，上衣和领带都飘了起来。我绊倒了，一百公斤体重和将近两米的身高重重地摔到地上，右边的袖子蹭上了沥青。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奔跑，扑到一辆出租汽车跟前，翻身跌坐在后排座上。

“丹麦酒店。”我说。

“不去。没听说那里爆炸了？”

“我付你双倍的钱。”

在内心最深处，我知道她没事。也许这是潜意识在回答我脑海中翻腾的问题。“她没事，别紧张。”出租车在公交车道上左冲右突，车队聚成长长的一列，想超过前面那巨大的德国柴油车是根本没门儿。“她会生还的，卡尔。”我看着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攥紧。哪个该死的家伙在喋喋不休地对我说卡桑德拉死了？是我的理智吗？卡桑德拉说，理智是一个紧箍咒，专门被发明出来压制人的创造性和创造的乐趣。“想想看，如果人都一窝蜂地追求崇高，可如何是好？”卡桑德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她戳穿了我。当我和梦想妥协，用理智战胜感情的时候；当我说，我的梦想其实不过是当一任大使的时候。她不信。她认为我是被创造出来从事更伟大事业的。“更伟大？”我注视着那双刚睡醒，近乎黑色的深棕色眼睛，“在我小小的世界里没有比大使职务更大的了。”我说。

她笑我，代表自己和地球宣布我胸无大志，问我愿不愿意以优渥物质生活的代价去换取某种改变。我常给接触到的人们留下愿意改变的印象，但其实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

“我说什么来着，”司机咕哝着，手指着警察设立的封锁线，“现

在咱们不能挪窝啦。”

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化学品恶臭，废墟冒着烟，幽灵般耸入云天。我意识到她不在了，消失了，像一根头发烧成灰那样。

失去了卡桑德拉，我失魂落魄，踉踉跄跄地穿过走廊、街道、市场、云雾，穿过对全世界的仇恨和忌妒的恐惧，穿过刀剑和子弹、来自灼热太阳的风暴、困在矿井风桥上找不到紧急出口的受害人群，以及一切被慷慨地赠予无望和痛苦的病弱生灵。没有卡桑德拉，我从空中坠落到地面。我摔倒了。

我出门的时候，她穿着白色晨衣，坐在早餐桌边跟罗伯特和阿尔伯特说话。我挥挥新公文皮包，送去三个飞吻。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用歌声唤我醒来，送上新烤的小圆面包、火腿蛋和芒果汁。我们对望着，她慢慢举起手放到嘴唇上，打了个飞吻，然后，她的形象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一样消失在哥本哈根的上空。

我是在读法学院时遇到卡桑德拉的。开始我以为会和她成为一对，但她有别的计划。卡桑德拉拥有我希冀的一切：敏锐、风趣、爱心、热情、宽厚、鲜明的个性、美丽。这样的人只有她一个。我可以肯定，她对我有兴趣，并且得到了确认。那是在一个同学的父母在厄勒海峡边豪宅里举行的聚会上。夜深时分她引领我走进一间浴室，她觉得好玩极了。突然，我们俩都脱得一丝不挂，拥抱在一起，我坐在马桶上，她滑坐到我身上，双脚紧抵地面，身躯上下运动，到达高潮的时候咬我的肩膀。然后她坐在我大腿上，将面颊贴到我的胸前。“我刚刚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感觉。”她说，“鸟在风中飞，猎豹在非洲平原上飞奔，狗熊一口咬住挣扎着的鲑鱼。如果我认真

倾听，可以得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是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的产物。”我吻了她的嘴唇，我想我找到了一生的爱情。

第二天，我却找不到她了。几个星期之后得知她从法学院退学，跟一个叫马丁·费斯克的家伙到印度去了。我的反应不像往常，并没有被抛弃时那种自杀冲动，也没有陷入心理窒息的悲惨境地。相反，主导我的是一种柔和的生存忧虑，伴随着持续的虚无感。我没有同时在当下生活、回想过去，并展望未来的本事。我总是想象着要到哪里去、我的生活在明天或者整整一年以后的这个时刻是什么样子、关灯睡觉的时候是否会心律不齐、躺在床上要不要测脉搏，以自我确认心脏是否在正常工作。然而，没有无底深渊，没有沮丧和沉沦，我不是哭天抢地抱怨环境和坏人的牺牲品和可怜虫。我们不是正式的爱人，就连不正式的爱人都算不上。当我三个月后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爱你，卡尔·伯恩斯坦”，我就明白，我们的爱不受任何限制，不论我们和谁在一起、做什么，爱都将永存。

所以，没什么可奇怪的，几年后她来电话要我搬进她家公寓里的空房间。对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她离婚后和一对三岁的双胞胎儿子住在那里。她也吸引女人。马丁·费斯克早已回到日德兰半岛和青梅竹马的爱人在一起，报名加入了右翼政党，然后就在社区政治和议会里平步青云。

“现在去哪儿？”出租车司机问。

“回克里斯钦堡。”

他把车开进一条棕色住宅楼之间的窄路，向左转上阿迈厄桥大街^①。手机网络断了，打不通双胞胎的电话。我加倍付过车钱，在克

^① Amagerbrogade，丹麦最长的商业街，在阿迈厄岛上，与西兰岛相隔一条渠道，共同构成哥本哈根城。

里斯钦堡入口前下车，向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示身份证卡。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却表示认可，带我上到一楼。公文包并不在我放下的地方。警察又带我到地下室去，公文包和其他失物一起放在角落里。首相的跑车也在。有人动过了我的东西，文件的顺序和往常不一样，我说了，却无人理睬。我只好就这样推出自行车，把公文包挂在把手上，飞身上车回家，经过运河上的桥，眼角扫过新港^①涌动的人潮。今天的气温高达二十度^②。我推车走进阿梅莲街上的院门，跑步走上通厨房的后楼梯。阿尔伯特和罗伯特正坐在电视机前哭。我坐到沙发上他们俩之间。

哭泣在肺的底部聚集，呼啸着通过喉头升起，冲出我的嘴，同时双胞胎也开始哭叫。他们抓挠撕扯着我的衣服，把眼泪抹在上面。我的感觉处在极端状态，喘不过气来。他们呼喊妈妈，她应该回家，他们用稚嫩的嘴巴呼叫着，脸扭曲了，通红的眼睛一无所见。我喘着气，竭尽全力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

① Ny Havn，一六七一至七三年间由瑞典战俘建造，以取代原有的港口渠道，故名“新港”。安徒生曾在二十年间住过四个地方。现在以路边酒吧咖啡馆著名，是哥本哈根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

② 丹麦的夏天很凉爽，一般在摄氏十五度上下徘徊，所以二十度算高温。

第二章

我甩掉能让人得幽闭恐惧症的套装，换上牛仔裤和短袖衬衫，拂去手臂擦伤处沾上的沙土细石，用温水冲洗伤口，然后让它自然风干。有人脱险，他们在电视上说，但不是在酒店里卡桑德拉工作的那一部分。各个频道都在显示直升机拍摄的同一画面，那座七十米高的建筑物依然矗立，因为许多雷管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引爆而得以幸免。然后镜头拉近到较低矮的附属建筑，那里设有会议厅、办公室和播音室等，已经变成横七竖八的钢筋和余烟袅袅的瓦砾堆。

播音员尖锐的声音在讲述，自从一家报纸刊登了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之后，恐怖活动在丹麦加剧了，让丹麦在伊斯兰世界声誉大损，并成为穆斯林武装分子恐怖袭击的目标。从那以后，丹麦情报部破获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具体数字没有公布，但今天出了岔子。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坚持说，丹麦酒店之所以被选为攻击目标，大概是因为保安措施比较薄弱，恐怖分子可以一次性伤害许多人。警方认为不可能是自杀行动，爆炸是通过手机遥控的。我把频道转到美国的有线新闻网，那里也有从封锁线现场进行的直播。

丹麦——安徒生的北欧田园童话王国——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近九时遭到了自“九一一”以来最严重的针对西方国家的

恐怖攻击。人类的残忍一劳永逸地揭去了这小小王国表面的粉红色油漆和罗曼蒂克的纯贞，直到今天之前，她一直幸运地置身于长期充斥于周遭世界的那些残酷之外。

电话铃响了，我把电视的音量调低。是我在外交部的顶头上司唐纳德，问我跑哪儿去了。反恐部门正在召开危机会议。

“国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境况之中，你却给自己放假！半个小时之内来见我。”听筒放下了。

我最近告诉过他，卡桑德拉在做了多年制片人后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广播节目，从设在丹麦酒店的演播室里播出，不过他当然不知道爆炸发生时她是否在那里上班。唐纳德不说闲话。他已经穿过针眼，当上处长，大使职位已经近在咫尺，谁也别想挡他的道。

但我没有去上班，而是带双胞胎去了国家医院。底层已经建立了帘幕隔开的两个急救中心，里面各有一桌两椅，我们被分配到一位危机心理学家。现在的关键是孩子们的心理康复。我一言不发，听他们哭着倾诉，释放感情，听取心理学家好心的建议，而这一切都融化在嗡嗡声、高叫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声当中。我突然明白，他们失去了母亲，卡桑德拉死了。他们无法预见到会有什么后果，我也不知道。但现在轮到我了。

“你或迟或早会进入一种状态，想到死者的时候会发怒。这完全是自然的，重要的是让你的情感自由释放。所有经验表明，那些哭、喊叫、骂人、把事情说出来的人能最好地对待危机。”那个蓄连鬓胡的人说。我试图捕捉他油腻镜片后面的目光。我很感激有他这样的人，将精力投放在帮助别人之上。他可以成为房地产大鳄、证券投机家、不错眼珠地紧盯着年终分红的无良银行家、冷酷无情的资本

家,但他没有。心理学家的眼睛忽闪着,受到情境的影响。他也有感情,不管他是否学会了控制,但这么多生命同时悬挂在无底深渊之上的黑暗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使最坚固的基础破裂。我很快地点点头,想对他说,我的机体被裹在无意义的紧身衣里透不过气来,但言词在我的嘴里变得干瘪。于是我告诉他,我主要想着阿尔伯特和罗伯特,他们正在高中毕业考试期间,明天将有丹麦文笔试。我不知道他们能否通过,也不知道是否应该代他们去要求延期补考。他们的父亲马丁·费斯克也不能置身事外。对,就是丹麦党的那个家伙,他们很少见到他,我也许更像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毕竟父亲是他而不是我。心理学家探究地看着我。马丁·费斯克正在忙着。不管恐怖袭击的后台是谁,都会制造出更大的对未知事物的仇恨,支持他主张的人数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丹麦会变得更仇外。这是马丁·费斯克梦寐以求的情况。我向桌子探过身去。

“是否由我来辨认遗体?”

“据我所知,她正处在一根雷管上方。”心理学家的声音很低,很费力才听得见他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没留下什么可辨认的?”

他微微点头,摘掉眼镜擦着眼睛。

一大群人簇拥在前厅墙上的电视屏幕前。双胞胎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门卫把音量调高了一点,我们停下来听,播音员在说,一个前所未闻的恐怖组织“资本主义末日”将录像带送到各大通讯社,宣布对哥本哈根发生的爆炸负责。一个包头蒙面的男人出现在屏幕上,用标准的英语传达如下信息:

我们是人类派出的战士。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住在你们

之间，说你们的语言，和你们一起工作。我们和你们一样是人，跨越宗教和政治团结起来对全球资本主义作战。全球资本主义将我们共同的地球破坏得不宜居住，并造就了一群经济游牧民，将千百万人驱赶出家园。在哥本哈根的行动只是多次行动中的第一次，我们将终结那遍布世界的损人利己的物质主义病症。哥本哈根行动消灭了十二个有影响的企业领导人，他们正在丹麦酒店开会，制订未来交换世界穷人的计划。我们对那些无辜的遇难者深表歉意，并为他们是在一场必要的战争中牺牲而感到欣慰。

我们推着自行车沿着神父湖^①畔走，在繁花盛开的栗树下坐下。我坐在他们俩中间，斟酌着字句。以前总是卡桑德拉先说出恰当的话，而我则给以支持。我转向阿尔伯特。他长得跟罗伯特一模一样，但毕竟是小的那个，晚了十分钟出生。

“我身上发抖。”他说。

“我也是。”罗伯特说。

“我也抖。”我喃喃地说。

然而，不止是我们从心里发抖，大地也在震动。我紧紧搂住两个孩子的肩膀，自行车翻倒了，道旁一个年轻女人抓起婴儿车里的孩子，坐到地下躬身护着孩子，栗树的枝杈在她头上摇摆，花瓣像雪片一样纷纷落下。背后有一位老妇人在呼叫，她没有抓住自行车，双膝着地倒下。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地震就停止了。

我们赶快回家，打开电视。这是丹麦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震中在哥本哈根市中心，靠近丹麦酒店的地方。电视台

^① Peblinge Sø，前文“五段湖”之一段。